

对外开放 40 年丛书
40 Years of Opening-up

主编 权 衡

副主编 赵蓓文 胡晓鹏



从应对挑战到积极主动

——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赵蓓文 等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从应对挑战到积极主动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赵蓓文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应对挑战到积极主动: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赵蓓文等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520-2871-3

I. ①从… II. ①赵…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全球化-研究 IV. ①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4840 号

**从应对挑战到积极主动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著 者:赵蓓文 等 著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3.75

插 页:1

字 数:178 千字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871-3/F·581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权 衡

副主编

赵蓓文 胡晓鹏

顾 问

张幼文 徐明棋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苏 宁 沈玉良 周 宇 盛 垒

目 录

第一章 参与 WTO 和全球化推进国内改革开放	001
第一节 对外开放: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001
第二节 双轮驱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002
第三节 体制建设:从政策性开放到体制性开放	006
第四节 战略升级:构建开放新格局	011
第二章 建立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	021
第一节 全球生产网络概述	022
第二节 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分析	025
第三节 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落差的原因分析	039
第四节 建立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对策	043
第三章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自贸试验区建设	050
第一节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和内容	050
第二节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自贸试验区改革	061
第三节 开放经济体制的经验总结和展望	068
第四章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073
第一节 自由贸易港概况	073
第二节 建立自贸港需要具备的主要条件	077
第三节 我国提出自贸港的国内外背景	080

第四节	探索建设自贸港的建议	089
第五章	拓宽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	096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约束现状分析	096
第二节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分析	110
第三节	化解对外投资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	116
第六章	中国整体营商环境的建设与完善	120
第一节	营商环境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120
第二节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趋势与国际比较:基于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	127
第三节	中国营商环境地区间比较:基于普华永道《中国城市 营商环境质量报告》	148
第七章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 40 年的辉煌成就与理论总结	151
第一节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	151
第二节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与成就	152
第三节	工业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总结	170
第八章	“超级全球化”影响与中国作用	174
第一节	全球化历史进程与“超级全球化”	174

第二节 全球化新趋势与“超级全球化”阶段	178
第三节 “超级全球化”的影响与挑战	183
第四节 中国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的作用	189
 附件：根域名服务器及域名系统的治理权之争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05
 后记	 212

第一章

参与 WTO 和全球化推进国内改革开放

1979 年以来,中国从改革起步,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从应对挑战到积极主动,中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

第一节 对外开放: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回顾历史,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走在世界前列。四大发明的出现、丝绸之路的起源,无不昭示着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历史古国的底蕴。然而,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一下子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历经多次政府更迭之后,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的整个经济已经千疮百孔,遭受了无法弥补的重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度缺乏资金,中国不得不通过向苏联举借外债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因此,举借外债成为中国吸收外资的一种特殊形态^①。毫无疑问,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从苏联举借的外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1959 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要求中国提前还债,也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

^① 对外资的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定义仅指外国直接投资,广义的定义则包括各种形式的间接投资。

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再次将中国的命运推向了风口浪尖。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挫折和损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时,中国的整个经济情况实际上已经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为了扭转这一形势,1978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年,1978年恰恰是前30年和后40年的分水岭。改革开放不仅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的历史抉择。正是由于中共中央正确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才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下,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二节 双轮驱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资本这一高级要素大量流入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那么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则为中国进一步吸引外资提供了重要的内部引力。1979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放营造了吸引外国资本要素流入的经济环境,改革创造了一个对外资有吸引力的、遵守规则的市场环境。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则进一步吸引了大量资本要素在中国的流动和集聚,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一、从改革起步:开放初期港澳台小型跨国公司逐步进入 (1979—199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原先的排斥外资转变为利用外资。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施

战略思想的转变,包括突破思想与体制障碍,通过各种方式消除外商的投资顾虑,从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一定的激励和保障,以解决各地从无到有利用外资的实际问题。

特区试验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从而建立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批窗口。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以后,提出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开放的目标。5月,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上海、天津、青岛和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洲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关于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中国的第5个经济特区。1990年2月,国务院同意将济南市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地区。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至此,沿海地区几乎全部开放,形成了以沿海开放城市为中心的沿海经济开放带,成功地实现了对外开放从点(经济特区)到线(沿海经济开放带)的目标转变。

由此可见,开放政策是以改革的方式起步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一大改革。这一改革使特区从旧体制中脱离出来,形成了对外部资本要素的引力,政策开放又进一步吸引了港澳台资本流入,最终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带等多种形式的

引资格局,成功地实施了邓小平“沿海与内地分步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取得了对外开放的阶段性成果。

二、全方位开放: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1992—2001)

从1992年到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是中国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阶段。经过第一阶段的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体制障碍已经消除,实际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因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大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一次飞跃,即实现利用外资达到数百亿美元以上。为此,中央制定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以进一步扩大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地区优惠政策逐渐向内地延伸,先后开放了边境对外开放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1999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的重大决定,给予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诸多优惠,实现了点(经济特区)、线(沿海经济开放带)、面(边境内陆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

在这个阶段,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带、边境内陆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全方位开放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不断实施所产生的对外部资本要素的巨大吸引,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继港澳台资本之后,欧美日等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抢滩国内市场,埃克森美孚、BP英国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西门子、松下电器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陆续进入中国,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

三、以开放促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开拓市场(2002—2007)

改革为开放创造了条件,开放又成为改革的动力。正是在改革与开放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吸收外资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1年末“入

世”以后,中国国内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按照“入世”承诺,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在 2002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中国已经将过去一直保密的民用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和制造以及历来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电信、铁路运输、商品批发等行业向境外投资者开放,表示了中国对高科技领域和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按照“入世”承诺,汽车等行业逐渐取消配额管理措施,并实施了进口关税的大幅度减让,分销服务、法律服务、旅游服务、教育服务、商业零售等也陆续对外开放。通过以上各种方式,中国吸收外资规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

四、提高开放效益: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7—2012)

2007 年以后,中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依靠国内改革深化和战略优化来提高开放效益的新阶段。

早在“十一五”规划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强调“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出“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培训中心。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增强配套能力,延伸产业链。吸引外资能力较强的地区和开发区,要注重提高生产制造层次,并积极向研究开发、现代流通等领域拓展,充分发挥集聚和带动效应”^①。

2007 年 6 月 25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②。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对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3-16。

②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6/25/content_6290208.html。

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①。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②。

在这一阶段,中国利用外资从注重规模到注重质量再到注重效益,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以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开放效益。

第三节 体制建设:从政策性开放到体制性开放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政策性开放走向体制性开放。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演讲,提出“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10-15.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11-8.

投资合作水平;深化涉及投资、贸易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我们将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①。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 20 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②。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③。具体包括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

① 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10-7。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11-12。

③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2。

贸易区建设和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三个方面的内容。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特别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①。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正式确立,《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走向新阶段。

二、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提高国际分工地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由发达经济体居于顶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居于底部的旧的全球价值链出现碎片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来替代原先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代表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旧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希望重塑全球价值链,也会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但是,如何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如何新的全球价值链中表达各方诉求仍存在很大争议。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更趋公平与合理,还将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

2013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就世界经济形势发表了题为“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演讲,指出“发展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

^①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2。

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增长联动,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要求。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相互帮助不同国家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平衡增长不是转移增长的零和游戏,而是各国福祉共享的增长。各国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完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①。

三、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国际经济地位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亚太各经济体应该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形成新的增长产业群,继续担负起世界经济引擎的重要责任”^②。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③。《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习近平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

① 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2013-9-5。

② 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言,2013-10-7。

③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2。

转型升级。

从适应全球价值链到重塑全球价值链,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利益诉求。这意味着中国从当前所处的俘获型价值链,通过企业战略、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逐步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直至与其他经济体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实现利益共享、普惠各方,互利共赢,使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更为公平合理。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也反映了中国希望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提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他提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之更加公平、公正。G20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充分协商的重要平台。要把G20建设成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①。这一方案与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一脉相承,与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的主张相吻合。“中国声音”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把握国情、世情,综观天下大势后得出的提升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论述,也是在融合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战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战略思想。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与世界银行正式启动“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努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审议,建设性地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等等。从国内战略、国际战略到全球战略,中国正在向世界宣告准备承担大国责任,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① 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2013-9-5。